



龔 雋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主任)

人間佛教之
跨學科研究暨應世之論述

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 (Marx Weber) 曾經批判包括佛教在內的東方宗教缺乏入世的政治智慧與經濟倫理，實際上也有很多學者反駁了韋伯的看法。有不少研究表明，佛教，甚至是印度佛教的發展中都表現出大量有關政治的論述，蘊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與倫理。



我主要談談兩個問題，一個是與我們研究方向有關的，即未來人間佛教在研究方面的拓展。目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都比較傾向於在學科間進行交叉性的合作研究，以便可以揚長避短。佛教社團是一個複雜而多面向的社會存在組織，我們過去對於佛教社團的研究，比較偏向在單一的佛教經典、義理或歷史的層面來作議論，而對於佛教更重要的生活世界卻關注很少。如佛教與社會生活、佛教與經濟、政治、教育，以及佛教與族群和民族主義等，這些都是一個存在於具體社會情境當中的佛教社群經常應對的問題。對於人間佛教研究來說，其在社會生活及政治教育等諸多方面所透顯出的智慧，其對佛法之用，對於當今社會來講，都是一項非常重要財富。佛教講體用不二，如果說傳統關於人間佛教的研究只是比較偏重於對人間佛教的思想作體性之探究的話，那麼未來對於人間佛教之研究，應該同時觸及其社會生活，即用之方面的討論。

其實，近代人間佛教的發展本來就是勇於面對生活世界的各種現實問題，而給出圓融而又超越性的解答。太虛大師就對諸多社會文化及政治、教育等議題，從佛教的立場發表過有價值的見解。雖然他的見解經常與當時主流知識社會精英的看法有許多衝突，但是現在看起來，這種對置，如果從包容的眼光來看，恰恰是可以互補的。於是，作為我們來研究具有人間性格的人間佛教，不能不去注意與討論其對當前社會生活及政治等諸多關係的

意見與貢獻。人間佛教的發展已經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人間佛教之探究，除了討論其思想，有關其社會效應方面的討論，卻相對顯得落後。或者說討論的專業化程度不夠高。於是，對於人間佛教的研究就不能夠僅拘泥于傳統佛教學術的局限，而應該把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等學科容納進來，進行跨學科的整合研究。這種跨學科的研究，對於習慣於在舊有模式裡研究的學者來說雖然有些冒險，但這種挑戰也同時是一次難得的機遇。

另外一個問題，其實也是宗教史研究中非常關鍵，而對於人間佛教來講也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即如何去理解與處理好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一直以來在佛教圈內，甚至在一般社會當中還流行著一種習焉不察的定見，即認為佛教是出世的宗教，所以應該以解脫，而不是入世關懷作為其重要的面向。

如果我們了解佛教史的人都會知道，實際上，佛教從產生以來就一直與當時社會生活與政治之間存在著非常複雜的關係。佛法是以解脫為目的，但是解脫的方法並非一定通過脫離社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來加以實現，有時候恰恰是在社會生活，甚至與政治活動的正當性的交織中去完成。大乘佛教的觀念更是如此，即主張從人間的種種面向中去轉向提升，這需要更大的勇氣與魄力，也可以說是慈悲心、菩提心具體而現實的開展形式之一。

學者發表／

人間佛教之跨學科研究暨應世之論述

中國佛教的傳統，過去有學者認為，就是政治化了的佛教傳統。這種說法不能夠簡單理解為對於中國佛教傳統的批評。中國佛教所產生的高度圓融的智慧，恰恰就是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的密切互動中，去體現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理境。這是需要相當的功力和境界才可以做到的。

德國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曾經批判包括佛教在內的東方宗教缺乏入世的政治智慧與經濟倫理，實際上也有很多學者反駁了韋伯的看法。有不少研究表明，佛教，甚至是印度佛教的發展中都表現出大量有關政治的論述，蘊含了豐富的政治智慧與倫理。

漢傳佛教關於政治方面的智慧寶藏非常多，而近代以來人間佛教傳統與社會政治之間的交涉也非常廣泛，但是這方面的有深度的討論卻很少，學者與教界還是存在一些心理上的陰影沒法抹去，好像討論佛教與政治的關係就是汙名化佛教。這種回避的策略不僅無益於我們對人間佛教作更完整的理解與論述，也表示了我們對於佛教史認識的偏頗。

近現代中國佛教運動就是非常有趣的一個例證。在中國佛教面對現代性的問題上，它與政治的關係成為一具有爭論性的議題。人間佛教運動基本主張佛教應該涉及對政治的關心。其實，更早些的，由知識份子所改造的「革命佛教」論，就以有利於行動性宗教革命

的結論，把宗教性的解脫倫理與俗世的政治解放融為一體。這些把救心與救世融為一體的知識份子發現，信仰比知識更具有革命性的精神價值。

太虛等就主張佛教的入世性包含了對於政治的關懷，儘管它的內涵主要不是革命性，而是建設性的。他的論域也相當的廣泛，如從國內、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現實困境到革命的意義和類型，甚至政治制度的形而上學基礎等，都進入了他的論說空間。在方式上，他主要是希望依賴佛教倫理原則來為現實的政治秩序尋找更深入的基礎。太虛大師把他對於社會政治的關切聯繫到當時所盛行的進化論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論述，並試圖在社會政治與佛教的共同進化中，為現代性的社會政治尋找某些佛教的資源，而同時也想以此來扶翼佛教在現代性社會空間中的合法性。這一劍雙刃的良苦用心，在他的「人群政制與佛教僧制」一文的論證結構中可以明確地體會出來。

大師急於應用佛教的立場去詮釋、評論當時社會政治，甚至中國社會所流行的各種政治、社會和道德運動，他都試圖納入佛教的立場來開出藥方。誠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一個研究佛學的人，對於世界的政治和經濟都無研究，於是，他這種強己所難的工作實際是出於菩薩道的社會情懷。更要注意的一點，是表面上是在闡述佛教的入世性或現代性，其工作的背後動力卻是熱烈的護法意圖。

學者發表／

人間佛教之跨學科研究暨應世之論述

當然，人間佛教如何在這種與社會政治應對中去保持佛法出世性的高度不受污染，服務利益社會政治生活的同時，也能夠意識到僧制與俗事是「不共之行」，從而保持住佛教在俗而不染，堅持佛教超越現實的不共法的一面是非常重要的。這在實踐上確實是相當的不容易的事情。歐陽竟無當年曾經力主于佛教的根源性，維持佛教超越的一面，而批判了人間佛教的政治論述與實踐行為，他的染淨二元論，具有西方啟蒙理性的劃界意義，但在佛教現代性方面過於極端的批判立場，或許恰如印順法師所批評的，「得之專而失之通」。

於是，對於人間佛教與社會政治議題的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同樣對於佛教界來講，也可以提供了一些有現實參考性的洞見。